

赤松德赞时期佛教在藏区的本土化

吴琴峰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 730020)

摘 要 佛教自7世纪40年代正式传入西藏后,受到了松赞干布到赤祖德赞等历代赞普的支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只限于王室宫廷,苯教在民间和上层阶级的信仰基础仍然十分强大。佛教要想在佛苯斗争中取得胜利,需要在民间建立一定的信仰基础,前提条件则是极力争取统治阶级的庇护和推广。这种“本土化”的契机出现在赤松德赞王时期,在莲花生大师和寂护等高僧的支持下,赞普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推动佛教自上而下地在西藏地区传播,佛教也得以在西藏正式立足。

关键词 藏传佛教 苯教 本土化 赤松德赞

中图分类号 B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589(2011)02-0136-02

从松赞干布到赤祖德赞时期,佛教逐步得到发展,但这种发展限于王室宫廷,上层阶级中笃信苯教的势力仍然强大。这时期,佛教的兴起与藏王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伴随着上层统治阶级以及苯教徒为维护权力所作的斗争。赤祖德赞时期,佛苯斗争的矛盾已经激化。赤祖德赞死后,继位的赤松德赞尚年幼,崇苯贵族尚玛尚掌握实权,发布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禁佛令”——“布琼法典”,将佛教势力逐出王室宫廷。尚玛尚的禁佛对佛教的打击很大,以至于赤松德赞成年后“阅览先祖之史传,传中言其有宏法之志等语”^[1],通过借助先王的威信来重新弘扬佛法,以对抗朝中反佛的大臣们。赤松德赞在掌握大权后,鉴于反佛大臣把持权柄并禁佛的教训,认识到通过倡佛巩固王室权力的重要性。故其在位期间,极力推行佛教,并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佛教的地位。

首先确立佛教对苯教的优势地位。赤松德赞于763年延请寂护为王臣讲解佛法,但只进行四个月就因迫于压力而终止。据“柱藏《遗训首卷录》”说:至赤松德赞时,又迎请静命大师(即寂护)。大师说十善法与十八界法,传入八关斋戒,因此引起地方的恶神厉鬼等不悦,念青唐拉山神雷击红山宫,亚拉香波山神水淹旁塘,十二丹玛女神对人畜施放瘟疫^[2]。当时藏区的佛教僧人偏重于义理宣讲,少有神异之举。这一点成为苯教师对付佛教的有力手段,他们借自然灾害请藏王停止弘扬佛法。当时,“仍处在苯教围裹中的吐蕃,人们对宗教的指向仅仅是招福攘灾而已,所以在当时吐蕃人的心目中,咒术力的强弱成为评判宗教优劣的

唯一指征”^[3]。因此要想推广佛教,必须要显示佛法的威力,在咒术上胜过苯教。故寂护建议赤松德赞邀请莲花生入藏,与苯教徒进行斗法和辩论。在佛教胜出后,苯教遭到公开禁止,“商定今后不再奉行苯波教,不准再实行死人超荐仪式。还商定除准许象雄的苯波教徒和御前苯教经师为国王消灾每年可定期举行杀牲祭祀鬼神仪式外,其他一律不准举行,准许为死者超荐而杀马,但家人不吃其肉。把苯波教的书籍全都丢入河里,剩余的,以后要压在黑塔底下。商定今后要倡行佛法,修建寺庙”^[4]。赤松德赞还举行兴佛盟誓并发布两道兴佛诏书,声称“兹发誓绝不毁损(佛法),并写成文书。从此以后,每一代王系均应发誓,大臣以下亦应盟誓”(第二诏书)^[5],以国家的力量确立佛教在西藏的权威和地位。

鉴于以前佛教在失去赞普的支持后遭到打击的教训,赤松德赞着手扩大信仰佛教的力量,从贵族阶级开始,自上而下地推广佛教的影响。他不仅笃信佛教,还让大臣们跟随莲花和寂护等学习佛法。在有了一定的信仰群体后,赤松德赞建立了专门的信仰场所——桑耶寺。据载,赤松德赞在兴建木桑耶寺之前,用计迫使臣民为此事出力。但在建寺开光安座仪式上出现的种种“神幻景像使国王和堪布大师十分欢喜,所有臣民都大为惊异,转生敬信”^[6]。从臣民前后迥异的态度来看,桑耶寺建立成为了佛教在藏区得到更普遍信仰的一个契机。这时期的桑耶寺作为专门性的讲经译经场所,表明佛教活动从宫廷转移出来,此后佛教的传播也就不仅仅只局限于王室贵族阶层了。桑耶寺还是

不同佛法辩论的地方,著名的顿渐之争即在此进行。可见当时的桑耶寺是推广佛教的中心。在建立桑耶寺后,“王召集吐蕃臣民,谓往昔吐蕃尚无出家沙门之例,今试观藏中有否堪作出家沙门。于大臣和属民中选聪明利根子弟七人,使从菩提萨埵出家……遂号为预试七人。此后复有王妃及诸臣民子弟三百余人皆出家作沙门。”^[7]从此,西藏开始出现固定的佛教团体——僧伽组织。

除了政治上的大力扶持外,赤松德赞还从制度方面加强佛教的推广。早在松赞干布时期就开始将佛教的教法融入法典的拟定中,“所订之纯正大世俗法十六条,特别是所订之戒十恶法,内容是:不准杀生之法……又,不授则不取之法……又,勿淫之法……又,禁谎言之法……又,饮酒节制之法。以上即为佛教之五根本法”^[8]。松赞干布以兼容并包的方式对待进入吐蕃境内的各种异质文化,吸收佛教教法的合理因素为其政权服务,表明了松赞干布时期佛教文化开始融入藏文化并发挥作用。到了赤松德赞时期,由于赞普本人的笃信,先祖将佛教教法作为法典拟定依据的做法成为其推广佛教的有力手段。赤松德赞在兴佛诏书中特地声明:“兹晓谕所辖属民、小王、吐谷浑王等并诸毗论及囊论,经商议之后决定:(1)依靠世尊佛之教诲,(2)依持先祖之范例规制。”(第二诏书)^[9]因为法律是各阶层都要了解和遵行的规范,将教法与法律相互渗透有利于教法在民众中的普及。同时,由于法律在社会上的效力,相当于佛教戒律同样也具有了效力,有利于加强佛教在各阶层中的权威性。除此之外,赞普还“发布命令,制定尊佛法律,废除挖男人眼、割女人鼻子以及有罪者处死等刑法”^[4]。

作为固定性佛教信仰势力的僧人是推广佛教的重要力量,为了使僧人们专门从事讲经译经等佛教活动,赤松德赞授予了他们种种特权(免除赋税和兵差),起初由官府为僧人提供给养,后又确立“三户养僧制”,从经济上巩固寺院僧团势力。其具体措施是:赐予(每座)寺院属民一百户,赐予每名僧人三户属民。对于(寺院)属民及僧众,官府无权干涉,将权力均授予僧人^[9]。属民制度使寺院能够形成自我封闭的经济单位,有利于“一种新的法人资格的发展,即拥有庄园和动产的寺院的扩张”^[10]。独立性的寺院经济以及僧伽组织的管理都需要专门的负责人,故赤松德赞委任“佛法宗师”作为僧团的领袖,总揽僧伽事务。后又在佛法宗师下设立十三位“寺院轨范师”。寺院内部的宗教组织逐渐完善。当吐蕃人益希旺波接替寂护担当佛法宗师时,“其(所说)则同于佛之所言”,改变了吐蕃以往倚重印度僧人的局面。由于益希旺波身份的特殊性,在其为佛教领袖之后,也被赋予了较大的政治权力:“赐予益希旺波以大金字告身,故其地位则在大尚论之上。”^[11]僧人的权力首次渗透进政治领域。这为以后西藏走上政教合一的道路开创了先例。

赤松德赞前期,苯教文化作为藏族人民的惯性信仰力量,已经深深植根于当时的社会,如苯教的祭祀方式在民间和国家祭祀中已经根深蒂固。赤松德赞在提倡佛教时,并没有禁绝苯教。这是充分考虑到严厉打击苯教可能会触怒贵族阶层和民众而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即使佛教

在辩论和斗法中胜出后,赤松德赞还准许“象雄的苯波教徒和御前苯教经师为国王消灾每年可定期举行杀牲祭祀鬼神仪式”。再者,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想在西藏立足,必须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才能为当时的社会所接纳。赤松德赞在推广佛教时很注意佛藏文化的融合和共存。所以也就有了下面一段话(关于寺院及佛教形状),神的工匠说道:“神像是建造印度型还是汉地型呢?”因此需要商议。对此堪布(菩提萨埵)说道:“因佛降临于印度,故当用印度风格!”而赞普则说:“如做成吐蕃风格,则可望吐蕃的那些贪慾罪恶的人们生起信仰之心,此举甚佳。”因此(属民)请求道:“那么请让建造吐蕃风格的神像吧!”于是(赞普)说道:“将吐蕃的全体属民集中起来,建造吐蕃型的佛像吧!”^[12]可见赤松德赞在很注重策略,并不是生硬地将佛教强加于民众。对佛教文化的适当修改以适应西藏社会显然有利于减轻过程中出现的嫁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不适”和激烈对抗。

无论是将佛教戒律转化为世俗社会可操作的法律条令,还是建立佛教的信仰团体——僧伽组织,给予僧人种种政治、经济特权等一系列措施,都表明了赤松德赞致力于佛教体制化的建设。该过程能顺利进行的根本前提是佛教文化推广者按照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需要对传入文化进行选择、吸收和重构。而通过赞普以及高僧莲花生大师、寂护等人的努力,佛教在作为局限于王室宫廷的一股暗流逐渐由上而下地向吐蕃整个社会渗透。无怪乎阿底峡尊者感慨说:“那个时期,在吐蕃的佛教盛况空前。连印度都没有过这种兴旺发达的时期。”^[13]

参考文献:

- [1] 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M].刘立千,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37.
- [2]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土观宗派源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33.
- [3] 朱丽霞,周松.佛教与西藏古代社会[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6.
- [4] 拔塞囊.拔协译注[M].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28-46.
- [5]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摘译(九)[J].黄颢,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4).
- [6]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98.
- [7] 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刘立千,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121.
- [8]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摘译(九)[J].黄颢,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2).
- [9]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摘译(十一)[J].黄颢,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4).
- [10] [意]图齐.西藏宗教之旅[M].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47.
- [11]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摘译(十)[J].黄颢,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3).
- [12]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摘译(七)[J].黄颢,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2).
- [13] 仁增·吉美林巴.涌莲藏真:藏传佛教前译派传承源流[M].洛珠加措,肖干田,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99.

(责任编辑/郭伟)